

学研究道路的年轻人,有很多后来成为英美汉学界的重要人物。

魏理英译汉诗取得很好的传播效果。从广度上看,1918年,魏理第一部译诗集 *170 Chinese Poems* 甫一出版,就受到 TLS 的好评,此后重版十余次。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改译其中6首,并在其剧作《四川好人》(*Der gute Mensch von Sezuan*)中借用魏理所译的白居易《新制绫袄初成感而有咏》一诗。此外,魏理的译诗有近20首被各家谱成乐曲演唱或演奏,还被译为包括日语在内的其他语言。从高度上看,早在1927年,魏理译作就被视为20世纪的英语诗作,编入 *The Augustan Books of English Poetry* (《盛世英语诗歌集》, London: Ernst Benn Ltd.) ,这是对魏理译作艺术成就的高度肯定。他的译作进而被选入多种英语诗歌的经典选本,并于1953年获得了许多诗人梦寐以求的英国女王诗歌勋章,代表英语文学界尤其诗歌界对其译作的高度评价。从深度上看,魏理译作为很多英语诗人带来了文学灵感。他不仅影响了庞德、艾略特等人,也影响了1950年代旧金山诗歌运动的主将施奈德(Gary Snyder)等人的创作。

作为东西文学之间的纽带,魏理所从事的翻译与介绍工作,使得原本对于西方读者来说艰深而神秘的中国文学作品,能够为一般读者所阅读、理解和接受。在中国文学与西方读者之间,魏理是一座桥梁,一座重要的文学与文化交往的桥梁。他将东方文学译介到西方,若干年后,这些已然成为经典的译作,甚至从西方返回东方,出口转内销,成为中国读者阅读和学习的文本。魏理翻译的一些中国文学作品,又作为双语读物被介绍回中国本土,比如外研社就曾引进出版了魏理所译的 *Analects of Confucius* 与 *Tao Te Ching*。不仅在中国大陆,在香港和台湾,也出版了不少魏理的译作。这堪称是中西文学交流与传播史上的一段佳话。

物质文化研究在政治大学

高桂惠

(台湾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系特聘教授)

近年,台湾的汉学研究,产生与物质文化研究(Material Culture Studies)相结合的潮流,笔者参加的台湾五所主流大学组成的“文学艺术与物质文化研究”(Material Culture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s)整合型计划便是这一潮流的一个例证。该整合型研究计划,由清华大学发起,台大、政大、师大和中央大学参与。就笔者所任教的政治大学物质文化研究,就在许多方面持续努力发展,积累、深化此一课题的学术能量,这些研究有些是相对成型的论述,部分则是尚在开展中的议题,本文试就这些研究现况作一鸟瞰式的勾勒,来回应此一课题的当代思考。

一、从体物入微的感知审美到文化体系的多重参照

首先,在中文学门本科的研究创新中,政治大学中文系以汉学视野为新取径,积极采用物质文化研究的新方法。笔者于近年的研究中不断尝试对文本的解读聚焦于“物”的认识论,透过明清小说的物质书写,考察其感知与认知双向涵摄的辩证思考,以及人类与物的互动中之种种想象,以文学手法使“物”成为审美的对象,并进而反思主体如何界定物质,而物质又如何透过“物质性”及其运用方式反身影响主体,甚至改变主体。笔者以故事细读的方式将不同故事加以参照,企图阐释在“民胞物与”的文化惯性思维之外,探讨文学如何从“物自身”出发,并反思人类民俗采风、博物传统习以为常的物我关系。

此外,由于明清时期“赏物”的文人化视野切入“物观”的物质书写,笔者由明清物质文化特有的“文化再生产”与“社会再生产”,以及文人擅长制造“奇货”、“奇癖”论述,拈出“物观视角”的重读,探究小说“采风”、“博物”、“赏物”的“物观光谱”,并旁及“礼物论述”的跨时空对话,探讨礼物精神的感性形式与礼物美学的精神载体的意义。笔者的明清小说的物质文化研究,亦透过与普林斯顿大学浦安迪(Andrew Plaks)教授的论坛交流,回馈到汉学界。

中文系的物质文化研究除了文本阐释与感知/感性的掘发,对于文献与图书的文化史、礼俗研究,不仅可以测绘文化象征、结构的参照体系,更进一步深化传统汉学的研究进路。如中文系杨明璋教授关注敦煌文献与日用类书对于婚嫁仪式的文学书写,从叙事角度论析“物”在变文中的美学作用,其挖掘的敦煌文献之特殊精神内涵,与以往西方汉学视域下的敦煌学研究已有不同,透过宗教、仪式、礼俗之面向,整合了“物”在文化中的象征与隐喻,使敦煌文献与日用类书的物质研究呈现新的研究风貌。又如林桂如教授关注晚明书籍出版文化,试图探究晚明出版市场书籍流通现象,林教授的文献考掘有日本汉学界的学风,对于晚明书业与狱讼出版文化的研究,展现细腻的学思与辩证。

中国早期叙事文本中的物质文化研究,以考证或索隐的方法探究当时经济面向为主,比较没有探究其语境、资本交换与文化体系中的关系。上述政治大学中文学门的物质文化研究,在文本语境、抒情美典、读物的商品经济脉络、文化系统的象征、物质的精神载体之意义等方面,企图更深度描绘文化体系的轮廓。

二、结合文史多元材料之新文化史研究

与国际汉学同步,采文、史结合的研究取向,其一大特点是运用材料的多元化,如:历史系的刘祥光教授研究宋史与近世社会文化、教育史的关系,运用了宋代《夷坚志》、时文稿、宋代卜算书籍等多种文史材料,勾勒宋代常民心理的风水文化与士子的科举文化;陈秀芬教授从文化史角度探究中国医籍与常民医疗文化之间的联系,并且扩展至女性身体的情欲论述、疯癫与疾病在身体的症候研究,对于民间保健手册的刊刻、发行如何形塑常民的养生、修身观念亦多所关注;金仕起教授则研究中国古代医疗史,包括方术、医案书写等面向,尝试以“疾病”的个案研究方式,追索古代中国在医疗观念上的发展面貌。

由于运用材料之多元化,使得研究面向大大开展,从科举文化、风水文化、常民医疗文化、疾病医疗以及养生保健文化,更带动结合多种文化的社会建构思考。进一步来看,物质文化研究有时整合了多种文化风貌于其中,如:吕绍理教授关注台湾日常生活与现代社会形塑的关联性,包括理发行业的形成、休闲娱乐生活的影响、探究了身体与社会关系的连结。吕教授从殖民文化的视角,探究近代台湾的化学工业与日常生活的变迁,并观察“发文化”如何从“贱业”成为“时尚”。这些研究,可以说是从庶民的日常生活,到休闲娱乐文化、身体技术、工业化、现代化、殖民文化等面向的错综复杂的连结。

相较于上述物质文化建构论与脉络论的逻辑,历史系朱静华教授的研究,比较了美国博物馆与两岸故宫博物院的展示,关注“画作展示”与“文化再现”的问题。朱教授对两岸故宫博物院艺术展览的典律形成之“文化再现”的研究,或可促使我们反思文化差异、“物性”的讨论方式、传统对“物”认知理论的分类范畴以及“艺术品”价值化的议题。

三、全球化、流动性的跨界、跨时空之物质文化研究

方兴未艾的“全球化”,不论是在资本、人才、商品、科技,或是语言、文化、知识、艺术、饮食,甚至移民、留学、婚姻都处于流动状态。流动将物质与非物质以各种不同的形貌,经由各种方式,进行多方

向的运动。为因应这个当代现象,政治大学外语学院近年对于物质文化的研究,整合了不同专业领域及语言的差异,深入探讨诸如旅行、无国界艺术、异/跨国饮食文化、后殖民/侨民文学、移民与跨族群婚姻、各国节庆的跨文化性、文化翻译等问题。^①以上种种国际学术潮流,渗入汉学,又超脱汉学,我们也加入这一潮流。

从巴塔耶(George Bataille 1897-1962)开始,物质文化研究从古老社会遗迹和他者的文明转向了当代生活,从借助于他者的研究,转变为直接对自己所在社会物质现实的研究。当这种研究视角进入我们跨文化的物质研究,现代人如何构筑一个以养护与装饰之“物”环就而成的生活美学体系,遂开展了当代城市生活、商品消费、女性保养等面向的探索。如:欧洲语文学系古孟玄教授以中西文女性保养品说明书之文本类型与特性为探讨焦点;英国语文学系陈音颐教授以伦敦城市小说为例,关注小说书写中的百货公司、女性展示、消费景观等议题;英语系胡锦涛教授谈论台湾当代作家焦桐《完全壮阳食谱》的食色经济学,这些研究取径,在消费与养护、装饰等生活美学体系中,突显了当代物质文化研究的闲适/俗世生活与人生的价值追求。

此外,在全球化下的“自我”与“他者”的比较反思中,翻译的可能性与礼物文化也是跨文化研究最突出的焦点,外语学院以“礼物文化”设题举行多次学术研讨会,关注文化翻译、社会文化诸多面向。如:外语学院院长于乃明教授讨论日本政界的送礼文化;张君松教授发表泰国送礼文化与禁忌;翻译中心主任张上冠教授发表《投桃报李:翻译作为(不)可能的礼物》;英语系伍轩宏教授探讨《当德希达“翻译”“礼物”》;欧洲语文学系阮若缺教授由法国饮食文化与餐饮礼仪的讨论,探究饮食品味与社会阶层的问题。“礼物”从物质性概念大大扩充了讨论范畴,“礼物文化”不论是就社会交际、政治外交、文化殖民等层面而言,都具有非常丰富的讨论层次。

四、余 绪

本文主要以政治大学中文学门、历史学门以及外语学院的跨文化中心的物质文化研究,开展一场可能的对话,深入推动汉学与物质文化研究的融合。相对于传统知识学门的稳定性(或是封闭性),投入物质文化研究的学者隐然被召唤进入一场难以化约的学术迷宫,不论是否成功形塑论述,在杂沓纷陈的光影中开掘知识原矿,就是一场饶有意味的工作。笔者揣度政治大学物质文化研究者的微言大义,有时妄下脚注,若有误导或不足之处,期待后继者持续切割、打磨这些矿石,使这些知识的光采,超越可见的物质原貌。

(责任编辑:桑海)^①

^① 在此特别感谢政治大学外语学院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徐翔生教授提供该中心2012年“第四届翻译与跨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计划书作为本文参考。